

## 从“不法凶徒”到“通贼逆匪”： 18 世纪中缅边界的汉奸现象

张 婷, 尤淑君

(浙江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汉奸”一词最早的含义是指在西南边疆地区违禁作乱的汉人。在 18 世纪的清朝官方表述中,勾结苗民或协助土司作乱,与苗民发生经济纠纷,贩卖人口,违禁越境贸易,向敌方泄露情报等构成了常见的“汉奸行为”。中缅战争期间,“汉奸”语义转为附外通敌,既反映出清朝统治者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汉人群体的疑虑,也反映了清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实行的不对等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开发政策与边疆社会实际发展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关键词:**清代;中缅边界;中缅战争;汉奸现象;西南边疆;边疆政策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2-0042-09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2.009

### From Culprit to Traitor: The Appearance of Traitors to China on Sino-Burmese Boundary in the 18th Century

ZHANG Ting, YOU Shujun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a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310058)

**Abstract:** The earliest implication of traitors to China meant the Han people who broke laws and took part in rebellions in southwest frontiers and the common behaviors officially included collusion with Miao people or the ethnic tribe leaders, economic disputes with Miao people, human trafficking, illegal trades,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etc. During the Sino-Burmese War,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raitors to China was semantically turned to colluding with enemies and reflected the suspicion from the contemporary governors to Han people, the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southwest frontier policies and the local social development due to the unequal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government.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Sino-Burmese boundary; Sino-Burmese War; the traitors to China; southwest frontier; frontier policies

#### 一、引言

品评善恶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20 世纪抗日战争时期,有人贬斥“汉奸”汇总“世界上一切卑鄙,下贱,愚蠢,无耻,盗窃,奸邪的词汇尚不足以代表他们的罪恶”。<sup>[1]</sup>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强烈憎恶汉奸。受民族主义的影响,今人对“汉奸”一词的理解和感受,基本沿袭抗日战争时期的说法。譬如,《辞海》定义“汉奸”为“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泛指投靠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

类”<sup>[2]</sup>。又如,《汉语大词典》将其解释为“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泛指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民族利益的人”<sup>[3]</sup>。不过,目前已有若干研究指出“汉奸”一词最早的含义并非“汉族的败类”。日本神户大学王柯教授指出,汉奸现象至少可追溯至康熙朝的苗疆地区,而“汉奸”一词最初指的是出卖清政府利益的汉人。<sup>[4]</sup>吴密认为,“汉奸”一词的出现时间可往前推至明朝末年,意指贵州水西宣慰司区协助土司叛乱的内地汉人,然后在清代雍正朝以降,“汉奸”的意义变成与“化外”民族交

收稿日期:2016-12-28

**作者简介:**张婷(1994—),女,浙江瑞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尤淑君(1979—),女,台湾宜兰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外交、政治文化研究。

往的汉人。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汉奸”的汉民族属性逐渐模糊,出现了非汉人被称为“汉奸”的现象。<sup>[5]</sup>由此可知,汉奸现象及其语意变化的原因,应与清代前期西南边疆开发政策密切相关。

马少侨<sup>[6]</sup>、王钟翰<sup>[7]</sup>等清史专家都曾论及雍正朝的汉奸问题。纪若诚(C. Patterson Giersch)<sup>[8]</sup>,<sup>[9]</sup>140-177 和杨煜达<sup>[10]</sup>也注意到中缅战争期间施尚贤的汉奸案例。吴密的博士论文全面考察了清代“汉奸”名实关系及其变迁问题,并在第二章探讨清代前期西南边疆地区的汉奸问题,进而指出西南苗疆地区的开发是汉奸问题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甚至注意到中越、中缅边境的“汉奸”已有“通敌”的性质转化。<sup>[5]</sup>张姍集中考察了鄂尔泰在治理西南期间对汉奸问题的认识与处理,并指出鄂尔泰处理苗汉关系时采取的强制性手段实不利于西南地区的长远发展。<sup>[11]</sup>黄梅进一步指出,整治汉奸问题是清朝处理边疆社会矛盾的重要任务之一。汉、苗隔离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却阻碍了苗民学习汉人的生产技术。<sup>[12]</sup>此外,张宁和鹿智钧利用“汉奸诉讼案”的档案史料,考察 18 世纪清政府关于“汉奸”的罪行依据与判罪标准,使汉奸问题的讨论更为具体化。张宁从法律的角度探讨了 18 世纪西南地区的汉奸现象,指出“汉奸”是一种政治不可控因素。随着清政府对苗疆的掌控力增强,“汉奸”也逐渐淡化,最终从这个地域的官方叙述中消失。<sup>[13]</sup>鹿智钧运用《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奏折》等档案史料,考察了清政府查禁“汉奸”的具体过程,指出“汉奸”词意的模糊笼统是造成相关法律规范“缺席”或“隐形”的根本原因。<sup>[14]</sup>

讨论 18 世纪中缅边界的汉奸问题,有必要参考有关清代前、中期中缅关系的研究成果。王巨新全面考察了清代中缅两国的交往,指出分布在中缅边境的地方政府是中缅宗藩关系建立的主要动力。<sup>[15]</sup><sup>[2]</sup>庄吉发和杨煜达也讨论了乾隆朝的中缅关系和清政府的对缅政策。其中,庄吉发认为,清政府

在中缅战争中“顺天而行,知难而退”,虽有损大国颜面,但其在战后采取恢复中缅朝贡关系的外交政策却是成功的。<sup>[16]</sup><sup>252-253</sup>杨煜达则指出,中缅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南边疆的政治军事控制。<sup>[17]</sup>这些研究对本文分析 18 世纪中缅边界的汉奸现象颇有助益。

综理既有研究成果,可知讨论 18 世纪中缅边疆地区汉奸问题的成果较少,故本文讨论 18 世纪中缅边疆地区出现的汉奸现象,探讨“汉奸”一词的内涵及其转变机制,并分析清代前、中期边疆地区出现汉奸现象的原因及其政治文化意义,进而探讨清代前、中期治边政策的特点与“汉奸”出现的历史语境。

## 二、汉人在清代西南边疆社会的角色

“汉奸”一词最早出现在清廷处理西南边疆<sup>①</sup>事务的过程中。道光二十年(1840 年)以前,汉奸现象主要出现在西南边疆地区。清雍正朝以后,清廷开始频繁使用“汉奸”一词。18 世纪,清朝官方表述中常见的汉奸行为包括勾通苗民,协助土司作乱,与苗民发生土司、房产等经济纠纷,贩卖人口,违禁越境贸易,向敌方泄露情报等。<sup>[5]</sup>可见,清廷官员定义下的“汉奸”,不仅包括犯法作乱的“不法凶徒”,更有“附外通敌”、带有“变节叛国”特征的“通贼逆匪”。本章将考察 18 世纪云南省的汉奸现象,并探讨“汉奸”语义的转变机制。

18 世纪,清王朝在西南边疆推行开发政策,导致边疆地区汉奸问题不断出现并进一步激化。<sup>[5]</sup>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1677—1745,满洲镶蓝旗人)以武力主持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尤其严厉打击了滇东北叛服不常的土司。其中,汉奸也成为鄂尔泰打击的重点对象。雍正四年(1726 年),乌蒙土司不满改土归流,顽强反抗。乌蒙府(今昭通市)米贴地区彝族土目禄永孝被捕后,鄂尔泰担心其妻禄氏家族群起反抗,于是派副将郭寿域率兵抓捕禄氏,

①所谓“西南边疆”,不仅指西南各省与东南亚诸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还包括作为国内边疆的苗疆地区。在中国古代,“边疆”一词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苗疆”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没有固定明确的地理范围,并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之“苗疆”相当于湘西、黔东南、黔东南、黔南和渝东南一带,亦即湖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处。广义之“苗疆”涉及云南、贵州、四川、两湖、两广等各省少数民族聚居或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大致而言,雍正朝以后,由于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统治的逐渐深入,官方所指“苗疆地区”基本上是指广义之“苗疆”。参考杜文忠:《边疆的概念与边疆的法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 年第 4 期,第 1 页;另见文后参考文献[5]。

结果遭禄氏夜袭,几乎全军覆没。鄂尔泰迅即派总兵张耀祖率兵镇压禄氏叛乱。张耀祖一入米贴,即下屠城令:“在者杀,去者杀,妇孺杀,小有姿首之女子不杀。苟稍持志节亦杀矣。汉人妻而有儿者,则其夫又必以汉奸杀。”<sup>[18]</sup>卷11,100可以推测,张耀祖所说的“汉奸”是指与彝族女子通婚的汉人。雍正八年(1730年),乌蒙土官之子禄万福因不堪忍受清军的暴虐行为,起兵反叛,东川所属土目和民人皆群起响应,形成一呼百应之气势。随即,鄂尔泰调集滇、黔大军三万人,分三路围攻乌蒙、东川。在这场大规模的捕杀行动中,汉奸是重点缉查的对象。据官修文书描述,这类汉奸“勾结”土目,参加叛乱,“代传木刻”,“惶惑人心”,<sup>[19]</sup>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在云南省东北区域的控制势力。显然,这些被清廷明令搜捕的对象,大多“无名无姓”,甚至连这些人是否真实存在都无法断言,莫衷一是。实际上,清政府镇压苗疆叛乱时,往往借由抓捕“汉奸”的名义,查找与苗疆存在联系的人,未经审判就处死,可知“汉奸”的存在正是清政府实行屠城镇压的正当性基础。与勾通土司或欺压苗民等“具体的”汉奸不同,这类汉奸未必有违法之行径,大多是清政府因警惕和猜忌边疆汉人而主观臆测的结果。

实际上,清王朝忌惮任何在边疆地区拥有较大势力并有可能形成潜在威胁的群体,尤其是汉人群体,更被视为清朝统治的威胁者。乾隆年间,经营茂隆银厂并大获成功的吴尚贤就是这样一位典型人物。

吴尚贤是云南石屏州(今云南石屏县)人,家境贫寒,后至永昌府境外的葫芦国<sup>①</sup>谋生。葫芦国富产银矿。乾隆八年(1743年)六月,吴尚贤与葫芦国酋长蜂筑(另译作蚌筑)商议共办茂隆银厂,酋长拥有所有权,吴尚贤担任厂主。<sup>②</sup>至乾隆十年(1745年)六月间,茂隆银厂集众数万,出银大旺,声播边境,大为成功。吴尚贤打算给酋长租银,但酋长“不敢收受”,表示愿照内地厂例“纳课作贡”。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月十五日,云贵总督张允随(1693—1751)上奏建议:葫芦国酋长“长僻处外域”,历来“未通声教”,今输诚纳贡,应当示以怀柔

之意,“准其内附”;但考虑到银厂“盈缩靡常”,“难为定额”,应当对其贡赋“减半抽收”,再将所取课银“以一半解纳,以一半赏给该酋长”。<sup>[20]</sup>602a-603b乾隆皇帝听取和硕裕亲王广禄(1706—1785,爱新觉罗氏)的建议,下令张允随详查吴尚贤“潜越界外开矿”之具体情形。<sup>[21]</sup>卷261,387b五月初九日,张允随覆奏:云南边外多矿硐,但当地人不谙采炼,多由内地民人前往开采;若禁止开矿,“势必并商贾一概禁绝”,如此一来,以此为生计的边民很可能“怨噎废食”;因此应准葫芦酋长输纳,并令其“捍卫边隅”,“设有内地逃犯等类潜入厂地”,即“敕令查拿”。<sup>[18]</sup>卷8,682-685六月三十日,乾隆皇帝下旨批准张允随所请,允许茂隆银厂“减半报纳”厂课,并将所收之一半赏给该酋长。<sup>[21]</sup>卷269,505b,506a

葫芦国和茂隆银厂归附内地后,吴尚贤被任命为课长,负责管理银厂事务。表面上,清政府委任吴尚贤是在重用他,实则是密切关注他在边境地区的行迹。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二月,吴尚贤为制止厂徒邹启周、张宽果等人在缅甸木邦另开厂矿,以保证茂隆银厂的持久昌盛,遂带厂练前往抓捕。乾隆十五年(1750年)正月,又带一千多名厂练赶赴缅甸,介入缅甸内争,意图说服缅甸王莽达拉进贡中国,以拉拢势力。<sup>[16]</sup>230,<sup>[20]</sup>604a缅甸东吁王朝无力平定国内叛乱,本就有意向清朝求援,便借此机会遣使跟随吴尚贤一同进京,“以驯象涂金塔敬关求贡”。<sup>[22]</sup>不过,缅甸使团尚未回到首都阿瓦,东吁王朝便被雍籍牙王朝取代,缅甸朝贡一事不了了之。吴尚贤是说服缅甸王遣使进贡清朝的关键人物,不但有足够的武装力量,还擅自介入缅甸内斗,自然加重了乾隆皇帝的疑心。

乾隆十六年(1751年)四月,乾隆皇帝听闻吴尚贤自愿伴送缅甸使赴京,于是命硕色和巡抚爱必达详查吴尚贤近来办理厂务之情形,并询问厂内是否还有“熟于厂务”,能够“压服众丁”的人接管课长一职。<sup>[21]</sup>卷387,83b,84a硕色调查后指出,吴尚贤本是“无籍细民”,平时“与夷境交通,往还习熟”,很可能“招摇引诱”,挟缅甸自重,在中缅边境培植势力,制造事端。

①葫芦国,一名卡瓦,“其地北接直隶耿马宣抚司界,西接外域木邦界,南接生卡瓦界,东接孟定土府界,距永昌一十八程,地方二千余里”。参见文后参考文献[20]。

②经王巨新教授考证,茂隆银厂位于今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班老乡上班老村西四公里处。参见文后参考文献[15]。

大学士傅恒(约1720—1770)也复议,吴尚贤“断不可令为课长”,建议免去。<sup>[21]</sup>卷393,159b,160a 曾任云贵总督的尹继善(1695—1771)奏称:“设官则法在必行,法行或不尽便于夷境”,以茂隆银厂远在边外、不便管理为由,建议改设课长。<sup>[21]</sup>卷394,174b,175a 乾隆皇帝综合各方意见,最终决定更换课长人选,并采取任期制,逐步解散茂隆银厂,同时下令将吴尚贤扣留在云南省城。乾隆十六年(1751年)十月,吴尚贤在由北京返回云南的途中,因“居功要挟”“煽惑夷使”“僭越妄为”“凶暴不法”“交通外夷”等罪名遭到拘捕,并被查封家产,最终死于狱中。<sup>[15]</sup>53-54, [16]231-232, [23] 不久后,茂隆银厂因吴尚贤去世,无以为继,厂众渐散。吴尚贤虽不是以“汉奸”入罪处死,但很可能成为后来附外“汉奸”罪名的判例根据。

值得注意的是,阿瓦地区的佤族部落里至今还流传着关于吴尚贤的美名佳话,<sup>①</sup>佤族中的“鹰/尹”姓就是因吴尚贤以鹰自比而取的。<sup>[24-25]</sup>显然,各个群体都是基于自己的立场和利益诉求,形塑以吴尚贤为中心的历史记忆和社会记忆。<sup>②</sup>对当地的佤族部落而言,吴尚贤是地方恶霸,还是部落英雄?恐怕不难推测。茂隆银厂创立之初,本不受清朝管辖,乃归葫芦国所有,后因吴尚贤说服葫芦国酋长内附,才使茂隆银厂成为清王朝的属地。茂隆银厂增加清廷税赋收入的经济意义是其次,更重要的是阿瓦酋长的内附巩固了中缅边防。晚清学者王之春(1842—

1906)指出:“缅酋素畏茂隆、波龙二厂,茂隆厂有壮丁数十万,波龙厂亦有在壮丁数十万;二厂强盛,为莽氏所畏,隐为滇省屏藩。”<sup>[26]</sup>吴尚贤遭捕入狱而死,茂隆银厂因之衰落,清政府表面上消除了这一边地的安全隐患,实际上却是自撤藩篱、屏障尽失。

### 三、中缅战争期间的“通贼”汉奸

清朝与缅甸的政治关系始于明清易代之际。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缅王迫于吴三桂等人之兵力,只得交献永历帝朱由榔,从此“不通中国”六七十年。<sup>[27-28]</sup>可见顺治、康熙年间,清朝与缅甸尚未形成正常的政治交往关系。<sup>③</sup>雍正九年(1731年),缅甸头目莽古叮告知清军守备燕鸣春,缅甸将于第二年进贡,但没能成行。<sup>[15]</sup>41 乾隆十六年(1750年),在吴尚贤的谋划下,缅甸东吁王朝第一次遣使清朝,但因东吁王朝的灭亡,清朝与缅甸未能正式建立宗藩关系。雍正朝至乾隆初期,正值缅甸内乱。由于清朝平定西南边疆未久,遂基本上采取安边守疆、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随着缅甸雍籍牙王朝势力的不断扩张,分布在中缅边境的小土司因不愿交纳贡物“花马礼”而与雍籍牙军队发生军事冲突,严重威胁着云南边境的安全。所以,清朝不得不放弃不干涉策略,以军事力量回应缅甸,试图恢复西南边隅“缓冲带”的稳定秩序。<sup>[15]</sup>58-66 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

①沧源佤族自治县班老一代仍流传着一首民谣:“佤人有宝,佤人不知晓;来了汉人吴尚贤,银子用不完。”转引自杨煜基:《吴尚贤与佤山银矿》,云南日报理论部编:《云南文史博览》,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5页。《石屏县志》记载,乾隆十五年(1750年)正月,吴尚贤率领矿厂壮丁进入缅甸,是“抵御外患”;次年,吴尚贤因“聚集丁壮,滋生事端”、“侵肥入己”、“随缅使人贡,于途生事”等“莫须有”罪名逮捕入狱,“惨死”狱中。参考石屏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石屏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35-736页。《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志》称,吴尚贤经营茂隆银厂期间,“肩负拓边守土及采炼银子双重重担”,他不仅是一位“敢作敢为的实业家”,也是一位“爱国爱民壮士”。参考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志编纂委员:《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志》(卷7),三联书店,1995年,第83页。

②美国学者纪若诚(C. Pat Giersch)指出,位于中缅边境的威远府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力量交流互动的“中间地带”;它并非“文化多元主义的诞生地”,更可能是一个“充满暴力和恐怖”的地方,其结果往往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一方获得主宰权。参考[美]纪若诚著,沈海梅译:《“混杂的人群”:中国西南近代早期边疆的社会变迁(1700-1880)》,陆韧主编:《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第146页。然而,黄菲博士纠正指出,不同人群关于同一事物的解释往往不同,即便在官方已经推出一套论证严密的说辞后,这种差异性仍被允许存在,并且有可能“压制”官方语汇而成为“主流”。参见黄菲:《祀真武或祭龙潭——清初云南东川府的信仰空间交叠与景观再造》,新史学,2012年第4期,第119-160页;黄菲:《移建文昌宫——清代云南东川府的景观再造与空间争夺》,历史人类学学刊,2013年第1期,第115-141页。

③乾隆、嘉庆、光绪三朝的《清会典》记载,康熙元年(1662年),礼部议准“缅甸贡道由云南”。但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纂修的《清会典》和雍正十年(1732年)纂修的《清会典》中,并未找到此记载。(根据书同文古籍数据库搜索结果)另外,康熙朝的《清实录》亦未记载缅甸入贡一事。可以推测,“康熙元年,议准缅甸贡道由云南”这一说法始于乾隆朝,并且很有可能是基于乾隆朝中缅政治交往的经验主观添加的。

一月,云贵总督刘藻(1701—1766)接到缅军入侵车里的急报,立即调兵剿逐入境缅军,中缅战争一触即发。

陆路互市<sup>①</sup>是中缅两国通商往来的主要形式。<sup>②</sup>滇南、滇东南地区与缅甸东北部存在极强的经济互补性。清朝统治者考虑到滇地边民的生计需要,并不禁止商贾贸易,“惟查无违禁之物,即便放行”。<sup>[21]卷269,505b</sup>乾隆十一年(1746年)五月初九日,张允随奉旨稽查茂隆银厂时,发现滇南各土司及徼外诸夷所食用之货物,“或由内地贩往,或自外地贩来,彼此相需,出入贸易,由来已久”。缅北宜种棉花,但“地广人少”,因此多是腾越等地的汉人移民“受雇前往”,“代为种植”。至收成时,商贩们就输往内地售卖,“岁以为常”,随后再将苏木、象牙、翠毛、木棉等销往缅甸,<sup>[18]卷8,683</sup>如此便形成季节性贸易。缅东北盛产矿山,但缺乏采矿的经验和技术,于是形成江西、湖广等地之贫民赴缅“采矿者以万计,商贾云集,比屋列肆”的景象。<sup>[18]卷8,784</sup>矿石开采和棉花种植是滇南边民的主要生计来源,经过长期物资交易,中缅边境逐渐形成了频繁的、具有较大规模的贸易市场。

中缅战争期间,中缅两国原来的陆路互市贸易被迫中断。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四月,乾隆皇帝命副将阿里衮(1769年逝世)、云南巡抚鄂宁调查缅甸贸易处所蛮暮、新街一带的贸易情况,尤其关注中缅战争期间是否有滇地边民潜越境外私自贸易的情形。据奏报,自用兵以后,两国边境贸易的一切税口“概行禁止”,多数商民不敢偷越。乾隆皇帝恐仍有商民违禁私出,遂命阿里衮等人严飭防守官兵密切稽查。<sup>[21]卷808,920a,b</sup>这年六月,阿里衮和云南巡抚明德建议严厉治罪越境贸易,“请嗣后奸民贩货出口,拏获即行正法;隘口兵丁,审系得财卖放者,一并正法;失察之文武官弁,查明参革”,乾隆皇帝准议。<sup>[21]卷813,994a</sup>滇缅贸易的禁止,极大影响了缅甸北部的商业发展,本来市肆密布的新街、蛮暮一带几乎成

了废墟。<sup>[21]卷808,920b</sup>不过,清政府禁止滇缅贸易,并不是为了遏制缅甸的商业发展,而是在于防止内地民人为缅匪通风报信,泄露军情。实际上,这一判断并非无中生有。云贵总督刘藻(1701—1766)主持滇缅战事时,中缅边境就曾发生过一起“汉奸案”,并引起清廷的高度重视。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云贵总督刘藻抓获与缅甸“结为姻党”、“探听消息”的内地民人施尚贤后,未经查证,即行正法。乾隆皇帝对此非常不满,斥责刘藻“办理莽匪事宜,拘于书生之见,动辄错谬”;并认为,施尚贤熟悉缅务,很可能为缅匪打探消息,“实为汉奸之尤”,若“严行讯究”,必定能供出“莽匪滋衅情形”;但刘藻却“草率一问”,称“严鞫无供”,“置紧要关键于不问”便将其“正法”。<sup>[21]卷755,315a,b</sup>于是,乾隆皇帝随即任命杨应琚(1696—1766)办理此事,一旦发现施尚贤有“心怀叵测,为缅甸探听军情,潜通信息,甚至为贼众前导,滋扰边疆”等不法情节,即“加之寸磔,予以族诛”。<sup>[21]卷784,920a,b</sup>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额尔景额奏称“生擒贼谍四名”,经审讯查出汉奸谢思道系湖南宝庆府武冈州人,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投顺缅甸”,往来边地,为缅甸“探听军情,潜通信息”。<sup>[21]卷799,775b,776a</sup>乾隆皇帝随即命人将谢思道的“父母亲、兄弟、妻子及合族不论男妇”拿解来京,严加治罪,并通飭中缅边界各关隘口官员严密盘查“违禁出入之人”。<sup>[21]卷904,84a,b</sup>在乾隆帝看来,施尚贤、谢思道等人交通缅甸之行径,不仅是罪犯,而且是对清王朝不忠的“逆犯”。<sup>[21]卷759,360b;[21]卷760,365b</sup>实在“罪大恶极”。<sup>[21]卷755,316a</sup>“殊堪痛恨”。<sup>[21]卷799,775b,776a</sup>因此,清政府对通缅汉奸的惩治大都实行连坐制,并缉捕乃至诛杀通敌者的整个家族,手段相当严酷。

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惩治通缅汉奸的处罚虽重,但并未制定有如“汉奸例”的律法。既无定法,那么清廷官员就得参照既有律例审理“汉奸案件”。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四月,乾隆皇帝传谕军机

①廖敏淑认为,清代中前期的通商制度是互市贸易,具体包括“关市”、“海舶”和“在馆交易”(相当于“使节团贸易”)三种类型。参考廖敏淑:《清代对外通商制度》,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33—434页。另见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22页。

②王巨新教授认为,中缅之间的经济交往以通商贸易为主,并不存在大量的朝贡贸易。且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中缅两国基本不存在“海舶”通商的形式。参考文后参考文献[15]。

处,转知中缅边境王世学等各犯“越关私贩”一案。<sup>[21]卷960,117a,b</sup>由于这时正值中缅“关禁严密之时”,因而这些越境贸易的汉奸并非按“私越<sup>①</sup>冒度关津例”<sup>[29]</sup>处置,而是照“谋叛例”审判处置。所谓“谋叛”,指“谋背本国,潜从他国”,凡共谋者,不分主、从,一律斩决,且其家族成员会因血缘亲属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知情故纵隐藏者”则处以“绞”。<sup>[30]</sup>最终,王世学被处以斩决,而容留王世学之王化南、杨经及李三老等内地民人被处以绞决,并且审批结果必须通过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共同主持的三司会审,由三法司核准后方可执行。由此可见,此类附外通敌的“汉奸案件”并不能交由地方官直接审理,必须押解进京,交由三法司和皇帝会同处置。若地方官未经上报便擅自处决通敌汉奸,便会落得与刘藻类似的下场。

总体而言,出现在中缅边境的“汉奸”语义,已与苗疆地区的“汉奸”语义不同,不再指“汉人中的奸徒”,而是违逆统治者意志的“叛徒”。对于这种“通贼逆匪”的惩治,清廷不仅仅从法律层面量以重刑,更将其上升至政治伦理的高度,谴责其不忠皇帝的道德问题。

#### 四、想象敌人:中缅战后清廷对通缅“汉奸”的警惕

中缅战争期间,乾隆皇帝意识到腾越边民“率非安民之人”,对清政府的边疆秩序存在潜在的威胁,故而极为重视边地民人与缅匪私通消息的情形,不过也意识到其中“良莠不同”,不能一概视为汉奸,治以重罪,否则将导致边民“望风疑畏”,不敢协助清政府出境探听缅情。<sup>[21]卷784,649b,650a</sup>可见,乾隆皇帝亦将边地民人视为一种借以窥探敌情的有效资源。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清政府利用“贸易緬城、熟悉夷情”的腾越商人李万全和尹士宾居中引介,招抚緬甸。招抚事宜似乎进行得相当顺利,緬方已进呈表文,“祈请投诚进贡”,但清政府后来发现,“该夷并未专遣一人,仅令内地被掠兵丁赍文投献”,遂怀疑李万全和尹士宾早已投靠緬甸,为緬方

所用。<sup>[21]卷812,971a</sup>此类汉奸,加以寸磔、族诛都是应得,但乾隆皇帝认为,若要“广见闻”,必不能“先蔽其耳目于事理”,<sup>[21]卷784,649b,650a</sup>遂命人密查李、尹二人勾通緬贼的行为方式及与二人往来的緬贼系何等身份。乾隆皇帝推断,腾越州民人中必定有不少同党,但他不建议立即采取剿杀措施,“倘查出一二人,即张皇办理,其余匪穷蹙,反激其助贼”,只是命阿里衮和明德驻兵伊家口,“加意留心密查”。<sup>[21]卷784,982b</sup>可见,重惩汉奸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探悉緬夷情形、方便军务才是当务之急。这一通敌事件使中緬关系更加恶化,双方均失去中介者与信任基础。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十一月,中緬双方在緬甸老官屯签订《老官屯和约》,时长四年的中緬战争结束。<sup>②</sup>然而,因中緬双方对和约内容有着不同的理解,两国关系未能立即恢复。

中緬两国停战后,清政府继续禁止滇緬互市贸易,意图借此招抚緬甸,永固西南边陲。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正月,老官屯緬军头目遣人呈送书信,请开边境贸易。乾隆皇帝下旨:“緬匪降表一日不至,一日不可许其与内地通商。此一节乃中国制驭外夷扼要之道,把握自我而操,最为长策。”<sup>[21]卷850,393b</sup>清政府决心全面切断中緬贸易,迫使緬甸向清朝俯首称臣。此前李万全和尹士宾使得的汉奸疑云,也引起清政府扩大搜索范围,担心有漏网之鱼。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陇川地区的某商贩尹小生和李萃,因姓氏、籍贯与汉奸尹士宾和李万全相符而被清军逮捕,并被严加审讯其与尹、李二人的亲属关系。<sup>[21]卷954,934a</sup>据尹小生、李萃二人口供,其与尹士宾、李万全并无关系,但乾隆皇帝怀疑二人畏罪隐瞒,仍下令将其二人押解到京,交由刑部审讯,同时再次敕令边地官弁,严密稽查潜出越境之人。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二月,緬甸头目得鲁蕴遣人投递緬禀,称要还人纳贡,恳求开关通市。次年正月,乾隆皇帝命李侍尧(1788年逝世)调补云贵总督,处理开关以后“沿边一切事宜”。<sup>[21]卷1025,728a</sup>但因緬人并未还人纳贡,清

①在《私越冒度关津》条例中,又有“私度”和“越度”之分。“私度”指过境之人持有“文引”(准予通行的文书),但随同的马、骡等没有“文引”,或冒用他人的“文引”,违者杖八十;“越度”指人通过规定的通道过境,但随同的马、骡等没有按照规定,违者杖九十。参考文献后参考文献[29]。

②和约规定:两国恢复友好邦交;双方交出在中国境内避难的所有土司、叛乱分子和流亡分子;双方交换战俘;每十年互派使团。

朝继续实行闭关禁市的贸易政策,并在李侍尧的支持下得到进一步强化。李侍尧到任后,立即采取以下举措:(1)禁止江楚商民潜往边境,并在边地推行保甲制度;(2)停止派人出关侦探消息,并禁止东南沿海地区进口缅甸棉花;(3)时刻留心,严行稽查,遇有私越边隘出入牟利者,即严拿重处,并参奏失察官弁,予以治罪。<sup>①</sup>对此,乾隆皇帝一一奏准。<sup>[21]卷1047,1029b,1030a</sup>显然,乾隆皇帝对“闭关禁市”政策的态度相当坚定。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为应付暹罗等周边国家的压力,缅甸国王波道帕耶主动派出使节奉表纳贡,借以改善中缅两国的关系。<sup>[31]</sup>至此,中缅宗藩关系才正式建立。然而,鉴于缅人善变,清朝并未在缅甸派出贡使后立即解禁中缅贸易,而是考察半年后,于次年三月实施部分解禁。如棉花,“为滇省民人需用”,“内地民人甚属有益”,可“稍存通变”。但私贩等贸易,仍应“照旧严禁”。<sup>[21]卷1325,942a,b</sup>直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缅王孟陨再次遣使奉贡,并恳请乾隆皇帝“敕赏封号”,“开腾越关禁”,中缅边境贸易才彻底解禁。<sup>[21]卷1351,90a</sup>

中缅战争无疑强化了清王朝在西南边境地区的闭关政策。即使滇缅边境开关互市,一旦发现缅方的汉文信件,清政府便又开始怀疑是否存在汉奸。嘉庆十七年(1812年)二月,西藏活佛第穆呼图克图上呈缅甸国王的汉字书信,嘉庆皇帝详阅后,以“汉夷言语杂,多不成文,夷字未经译出”怀疑是否为边境心怀不轨的汉奸假装寄来,便速命云贵总督伯麟(1823年逝世)仔细查办。<sup>[32]</sup>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明朝为沟通“华夷之情”,设“四译馆”翻译“四夷”言语文字,其中便设有缅甸馆,<sup>[33]</sup>清朝沿袭了这一制度。因此,当原本需要“重译来朝”的缅甸寄来汉文信件时,清朝统治者不免再起疑心,要求地方官员暗中查办,导致中缅

边境地区潜藏着查缉汉奸的紧张气氛。

由上述可知,中缅战争期间,不少汉人为缅甸提供中国内情。清政府在滇缅边境实施闭关禁市政策时,腾越等地有不少民人似乎无视禁令,仍私自出关贸易。这能否说明边民们一味地追求蝇头小利,而不具备“天朝子民”应有的法律意识和道德伦常观念,是未经“教化”的“野蛮人”?美国学者纪若诚的研究或许有助于解答这一问题。纪若诚通过考察清代前期西南边疆的社会变迁,指出贸易网络的形成、语言使用变化、异族通婚、族际互动等都会导致边民们产生新的认同感。<sup>[9]140</sup>他认为,尽管自明代以来,汉人移民就已散居于这一“中间地带”,但由于地缘、宗教、政治、贸易等多种因素,这些移民更倾向于缅甸和暹罗<sup>②</sup>,而不是中国。<sup>[9]146-147</sup>也就是说,所谓“天朝子民”的政治身份,很可能只是清朝单方面的要求,并非是滇缅边境汉人移民的心理归属和文化认同。

中缅边境的汉奸现象反映了传统“大一统”帝国与“新兴”边缘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固守边疆是传统帝国始终奉行的治边策略,边疆秩序是否稳定,直接关系到中央政权的兴衰存亡。尽管清朝统治者十分清楚,手工业、矿业和商业贸易是地处帝国版图西南边缘的腾越、思茅等商业化城市的主要经济活动,<sup>[34]200</sup>但是为了逼迫缅甸新朝归附中国,承诺不再进犯,永做屏藩,清朝统治者只好继续沿用“闭关禁市”的政策,直至缅甸遣使入贡。显然,云南边地社会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开发问题处于不对等的地位。

中缅边境是一个以陆路互市为介质,具有极强流动性的“中间地带”。其流动性首先体现在因贸易活动而设立的交易市场、商业会馆、缅甸的“汉人街”等具象事物上。<sup>[10],[35]</sup>乾隆中叶,被称为“汉奸”的腾越(今腾冲市)和顺人尹士宾就是当时阿瓦地

①关于李侍尧到任云贵总督后实施的一系列闭关禁市的举措,可参考文后参考文献[15]。

②从谭其骧先生编制的明朝地图来看,滇西南、滇南分别与缅甸和八百大甸接壤;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清朝版图显示,滇西南、滇南与缅甸接壤。参考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2年,第7册,第40-41页;《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第8册,第3-4页。据《明史》记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设八百媳妇宣慰司;永乐二年(1404年),改设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嘉靖年间,八百大甸为缅甸所并。《明史》将八百大甸列入“云南土司”一节,暹罗编入“外国传”。可见,在明朝关于“天下”的想象中,八百大甸和暹罗位置不同。嘉靖以后,八百大甸为缅甸吞并,就更与暹罗领地无关了。参考[清]张廷玉:《明史·云南土司三》卷315,中华书局,1974年,第8160-8161页、第8163页。由此可以推测,明代以来散居在“中间地带”的汉人移民,其认同可能是倾向傣人社会而非暹罗,纪若诚的说法仍待进一步考证。

区“汉人街”的“街长”。<sup>[35]</sup>“中间地带”的流动性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异族通婚。清代, 边地的汉人移居缅甸, 绝大多数是男子, 因此和当地妇女通婚, 这是其在地生根落脚的关键。<sup>[10]</sup>出现在中缅边境的“汉奸”, 大多都是娶缅甸女子为妻。上文提到的尹士宾, 其妻便是缅人。“汉奸”施尚贤, 原是云南一个穷苦人家的幼子, 自小便被买给另一个汉人家做女婿。1748年, 他离开这位汉人妻子, 独自移居至缅甸边境做生意, 后来又与当地的土著女人结婚。<sup>[9]138</sup>异族通婚往往会改变婚姻双方的生活习惯、语言文化, 进而造成对本族群认同感的模糊和缺失。

无论是跨境贸易, 还是异族通婚, 都是清朝统治者一直忌惮的, 他们忧虑“安全利益往往会被追求经济利益的汉人移民们遗弃”,<sup>[9]165</sup>却无能为力。清朝统治者要求中外边境的汉人群体政治忠诚, 安分守己, 永固边陲, 但处于“中间地带”的汉人移民却往往倾向于与其结为利益共同体的“外夷”。清政府政治目标与边缘社会的实际需求存在巨大落差, 两者的冲突造成边民们的认同困境, 导致出卖国家利益之汉奸的出现。吊诡的是, 类通敌汉奸比苗疆地区犯法作乱的汉奸, 更容易受到来自道德层面的谴责。

### 五、余论: 流动的人群与失序的社会

18世纪初期, 新王朝政权基本巩固, 清朝统治者试图掌握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的趋势, 巩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sup>[34]1</sup>由于各边疆地区的军事地位存在差异, 故清朝统治者实行不同的治边策略。清朝统治者虽然在西藏、回疆、蒙古等地实行“藩部”制度<sup>①</sup>, 但在西南边疆推行的是改土归流、人口移民、开辟生界等政策, 使其逐渐纳入郡县体制中。显然, 中原地区难以维持生计的贫民、富有开拓精神的商人, 进入西南边疆地区的机会成本更小, 这就使得西南边疆成为汉奸问题发生的主要区域。

中缅边境的汉奸问题, 反映出清朝的边疆政策并不适合边疆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陆路互市是中缅经济交往最主要的方式, 滇南、滇东南与缅甸东北部相接地区都设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土地贫瘠、矿

产资源丰富、毗邻缅甸等自然、地理条件, 造就了滇缅边境主要城市商业贸易繁荣、流动性强的特征, 如腾越、思茅。中缅两国的政治交往因战争被迫中断后, 缅甸新街、蛮莫一带的贸易场所迅速凋敝。但清政府注意到, 滇南边远地区普遍存在潜越关隘、出境贸易的汉人, 更有不少汉族男子与缅人女子通婚, 定居缅甸, 甚至存在中缅战争期间为敌方提供内情的通敌汉奸。对于久居中缅边境的汉人来说, 他们与缅人分享着更多的公共空间和共同利益, 因此当缅人与遥远的清政府发生冲突时, 他们并不能意识到国家安全利益的至高无上, 自然就不会停止与缅人来往。中缅两国停战后, 清政府为了逼迫缅甸投降, 强化对滇缅边境的政治军事控制, 不顾互市贸易的必要性, 继续闭关禁市, 直至缅甸遣使入贡, 中缅确立宗藩关系。可见, 在清朝统治者的认知和决策中, 对云南边地社会的政治控制优先于经济开发, 因此造成中缅战争期间中缅边境出现大量汉奸现象的失序状态。

吴密指出, “汉奸”话语产生的思想和观念基础乃是传统华夷观念。<sup>[5]</sup>清朝统治者在对待“苗蛮”“缅甸”等未受“汉化”的群体时, 皆存在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心态, 认为正是因为有汉化程度较高的汉人从中作梗, 边疆地区才会出现叛乱。所以, 当边疆地区发生不利于清王朝稳固统治的事件时, 参与其中的汉人便首当其冲, 成为汉奸。由上述可知, 清代前、中期出现在中缅边境的“汉奸”话语, 不仅是华夷观念造成的结果, 也是传统帝制国家与新兴边疆社会利益冲突的产物。

### 【参考文献】

- [1] 潘菽. 汉奸的心理分析[J]. 新民族, 1938(3): 4-10.
- [2] 巢峰. 辞海[M]. 缩印本.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886.
- [3] 罗竹风. 汉语大辞典[M].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0: 49.
- [4] 王柯. “汉奸”: 想像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J]. 二十一世纪, 2004(83): 63-73.
- [5] 吴密. 民族和国家的边缘: 清代“汉奸”名实关系及其变迁[D].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 2011.

<sup>①</sup>清代藩部是清王朝统治下, 与清朝建有宗藩关系, 并享有一定自治权利的少数民族部落, 如回疆、蒙古等, 是清朝藩属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考张永江: 《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4年, 第7页。

- [6] 马少侨. 清代苗民起义[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 40.
- [7] 王钟翰. 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始末[G]//王钟翰清史论集.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1401 - 1402.
- [8] C. Pat Giersch. "A Motley Throng": social change on south-west China's early modern frontier, 1700—1800[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01, 60(1): 67 - 68.
- [9] 纪若诚. "混杂的人群": 中国西南近代早期边疆的社会变迁(1700—1880)[M]//陆韧. 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 沈海梅, 译. 云南: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
- [10] 杨煜达. 清代前期在缅甸的华人(1662—1795)[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3(4): 44 - 53.
- [11] 张姗. 鄂尔泰对西南地区"汉奸"的认识及治理[J]. 贵州文史丛刊, 2013(4): 62 - 66.
- [12] 黄梅. 清代边疆地区"汉奸"问题研究[D]. 昆明: 云南大学, 2016.
- [13] 张宁. 18 世纪的"汉奸"认定与"隐形"的法律文献[J]. 法制史研究, 2012(21): 163 - 188.
- [14] 鹿智钧. 险恶之害: 清朝前中期西南地区的"汉奸"问题[J]. 政大史粹, 2014(27): 1 - 28.
- [15] 王巨新. 清代中缅关系[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 [16] 庄吉发. 清高宗时代的中缅关系[G]//明清史研究论集. 台北: 大陆杂志社印行, 1975.
- [17] 杨煜达. 乾隆朝中缅冲突与西南边疆[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130 - 139.
- [18]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 [19] 鄂尔泰. 清世宗实录: 第 99 卷[M]. 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6b - 19a.
- [20] 中研院史语所. 明清史料·庚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0.
- [21] 庆桂. 清高宗实录[M]. 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22] 方国瑜. 滇西边区考察记[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42.
- [23] 杨煜达. 乾隆朝中缅冲突起源研究[G]//林超民. 新风集: 云南大学 2000—2002 届中国民族史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集.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3: 591 - 660.
- [24] 邹建达. 独具特色的边境佤族: 云南沧源县勐董镇永和社区调查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00.
- [25] 袁娥. 民族与国家何以和谐: 云南沧源佤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实证研究[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129 - 130.
- [26] 王之春. 国朝柔远记[M]. 台北: 华文书局, 1968: 301.
- [27] 杨陆荣. 三藩纪事本末: 第 4 卷[M]. 吴翊如,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70 - 75.
- [28] 赵尔巽. 清史稿: 第 582 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14661.
- [29] 朱轼. 大清律例总类: 第 3 卷[M]. 苏州: 江苏书局, 1889: 77.
- [30] 阿桂. 大清律例: 第 23 卷[M]. 张荣铮, 点校.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 1993: 359.
- [31] 李萍. 台议中缅战争后的中缅朝贡关系[M]//南亚东南亚语言文化研究.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6: 133 - 134.
- [32] 曹振鏞. 清仁宗实录: 第 254 卷[M]. 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437a、b.
- [33] 陈梦雷. 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 第 10 卷 译言待宾之礼[G]. 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34: 42b.
- [34] 韩书瑞, 罗友枝. 18 世纪中国社会[M]. 陈仲丹,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 [35] 黄素芳. 对云南腾冲人出国的历史考察[J]. 东南亚, 2007(1): 58 - 64.